

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在上海病逝。由于前来哀悼的各界人士太多，在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，追悼会连开了三天，周海婴回忆道：“七八点钟以后，前来吊唁的人也慢慢增加了，但大家动作仍然很轻，只是默默地哀悼。忽然，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，外边有一个人抢起快步，跨进门来，我来不及猜想，人声惊到，只见一个大汉，直奔父亲床前，没有犹疑，没有停歇，没有俗套和应酬，扑到床前，跪倒在地，像一头狮子一样，石破天惊地号啕大哭。他扑向父亲胸前的时候，一头扎下去，好久没有抬头，头上的帽子，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，一直滚到床边，这些，他都顾不上，只是从肺腑深处，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，倾诉了对父亲的爱戴之情。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中望去，看出是萧军。”

在所有和鲁迅关系密切的青年人当中，萧军与萧红得到的关怀和支持最多。而萧军一生对鲁迅怀有无比诚挚的感情，他视自己为“鲁门弟子”，以传承鲁迅的衣钵为己任。他曾公开宣称：“鲁迅是我的父辈，而毛泽东只能算是我兄长。”就在鲁迅去世前几天，萧军才从青岛回上海，他和恩师鲁迅已经一年未见了。回到上海后，萧军立刻去看望病中的鲁迅，带去了有养生功效的青岛小米，还给海婴带了五个红红的大石榴。他本来来给鲁迅挑选了一个泰山石笔架，结果忙中出错，忘记带来了，鲁迅笑着安慰他：“那不行，不行的。”没想到，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。萧军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，鲁迅已然与世长辞。悲痛之余，萧军作为与鲁迅亲近的学生，加入了“治丧办事处”，承担着各项琐细的具体工作。萧军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前，不眠不休，举目无亲，而鲁迅并不急于与他们相见，个性耿介的萧军发出了这样的抱怨：“我们像两只土拨鼠似的来到了上海！认识谁呢？谁是我们的朋友？连天看起来也是生疏的！”事实上，萧军的牢骚完全是由于不了解鲁迅当时的处境。几十年后，萧军对自己当年怀有的疑惑情绪忏悔道：“当我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期以后，我才知道了自己所知道的上海政治情况，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已，事实上险恶与复杂，是在想象以外的。”当时的鲁迅，已被政府当局通缉几年，自然格外小心谨慎。尽管如此，鲁迅依然及时给他们回信，只不过提出见面的事，应当“缓一缓”。与此同时，他的真诚与关怀又是不容置疑的。回信后，鲁迅第二天又给萧军、萧红写信，特别提醒他们：“上海有一批‘文学家’阴险得很，非小心不可。”并再次发出友善的讯息：“我想我们是有看戏的机会的。”

萧军和鲁迅的师生之情，缘于1934年两人的首次通信。当年，在朋友们的资助下，萧军、萧红在东北出版了署名“三郎”、“悄吟”的小说散文合集《跋涉》，这也是“二萧”惟一的一本合集。但没想到，这本涉及“反满抗日”的小书，给他们带来了性命之忧——被日寇通缉。6月15日，萧军、萧红被迫逃离哈尔滨，经大连流亡到青岛。在青岛，萧军担任了《青岛晨报》副刊的主编，这是由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办的一份报纸。9月，萧军继续创作《八月的乡村》，萧红完成了《生死场》，他们一起讨论这两部作品，不知道所选题材和立意是否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合拍，便萌生了向当时的“文坛盟主”鲁迅求教的愿望。10月初，萧军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，令他大感意外的是，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。鲁迅在复信中回答了萧军的疑问：“不必问现在要什么，只要问自己能做什

长期以来，人们对于作家萧军的认识还停留在名作《八月的乡村》所奠定的小说家形象上，却忽略了他还是一位造诣极高的诗人，且相对于新诗而言，他更是才华横溢的旧体诗创作者。对此鲁迅先生就曾坦言，“萧军的旧诗比新诗要好”。当然，在诸多写作旧体诗的现代作家中，萧军的成就与影响虽不及鲁迅、郁达夫、郭沫若及聂绀弩等人突出，但他那些古朴苍劲、大气恢弘的作品却也独具特色，显示了极高的水准。

萧军旧体诗创作的历史可谓悠久。从1925年他在吉林城当骑兵时初学旧体诗，到1979年恢复名誉并写作《忆踪录》《还乡杂咏并叙》等篇章，前后超过50年的时间。其间，他的代表诗集《黄花吟草》《梦回吟草》《故诗拾遗录》《囚庭吟草》《陶然吟草》《悲余吟草》等，被命名为《五十年故诗余存录》，收录有近800首诗作。而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萧军近作——一九七九年诗文选辑》一书，则又收录了他创作于新时期以来的部分作品。如此丰厚的创作实绩，足以令人侧目。

萧军曾多次表达了自己对旧体诗的“偏爱”：“对于自己所写的东西，虽属‘一母所生’，却有‘亲’、‘疏’之别。除开某些为了‘义务’或其他原因写的东西不算以外，仅就散文（小说在内）和韵文来说，我就以为散文之类是为别人写的，只有韵文——特别是旧体诗——才和自己有着血肉关联。因此在几十年前写下的一些旧体诗，到如今我还能记得若干首，有时还要吟咏它们，看看它们。其他就好像和我没什么关系了。这就是我对待自己作品的一点‘偏私’真情实话：‘别的文章全是为了需要，为了旁人写的，只有旧体诗，才是为自己写的。’”（萧军：《萧军近作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86页。）由此可见，萧军其实对旧体诗倾注了更多的个人情感和人生体认。

纵观萧军的旧体诗作品，大致有如下几类：祭奠志同战友、哀悼领袖先师，描绘居处小景、缅怀旧迹行踪、书写故乡风物、歌颂山川河流、咏怀历史古迹、赠寄亲朋故旧等等。其中虽不乏游山玩水、应和酬唱等饱含个人趣味的消遣应制之作，但大部分作品都是以生活经历为原料，认真观察和思考的人生短章，在“自慰自娱”之外，描绘出细微的人生感受，表露了真实的思想情感。这些旧体诗作虽远不及他的小说那般为人熟知，但却是切入萧军个人性格与人生遭际，显示他思想发展历程的绝佳材料。此中个人性情的流露和思想的闪光，既夹杂着作者对自我人生际遇的感受和对理想人格的追索，又饱含着古典诗词所独有的艺术美感，读来令人久久回味。

### “醉酒狂歌自风流”

在《我的文学生涯简述》中，萧军讲述了自己“被选拔为‘子弟兵’”的传奇经历，这便是他与文学、与旧体诗的最初缘分。1925年间，他到吉林城一个骑兵营当了骑兵。因读过几年书，又写得一笔小字，在多为文盲的兵营中颇为少见，故被提拔为“子弟兵”，后到营部的书记处成为“见习上士”。因此就有着很多的空余时间可以读书，写字。当时的书记长罗炳然，有一脑子家传的“五经四书”和“诗歌辞赋”的知识，在他的影响下，萧军开始学习如何做诗。他每天以《古唐诗合解》《诗韵合璧》《幼学琼林》等为课程，日夜读背“唐宋八大家”的古文和其他古典诗词，很快便习得要领，写出了处女作《立秋有感》：

刹那光阴又到秋，天光云影望中收；  
最能涤我胸襟处，痛饮“松江第一楼”。

随后陆续有《游龙潭山》《过松花江》等作品，虽多为写景抒情的习作，但也笔力细腻。我们且看《待渡》一首：“轻舟横小渡，波映晚霞红；树锁烟岚翠，秋风送短蓬。”寥寥数笔，便意境全出，堪称佳作。自此以后，青年萧军便爱上了诗词楹联的创作，“每有所感，即写诗抒情”，几十年不缀。

当然，作为一种古老的文类，旧体诗所连带的历史记忆和现实趣味，势必在爱好者身上打下烙印，让他们沾染一些古旧的气息，萧军也不例外。我们审视他早期的作品，便可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。实际上相当多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，他

## 萧军和鲁迅

□陈 艳

么。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字，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，那么，无论他写什么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……”接到这封信的萧军兴奋异常，和萧红读了又读。萧军真切地感到：鲁迅对于一个素未谋面的青年人，竟能够做到如此“披肝沥胆，推心置腹”，真正具有伟大的灵魂、人格和胸怀。

接到回信后，萧军将《生死场》的抄稿和《跋涉》，连同“二萧”的“美丽合影”一起寄给了鲁迅。就在这时，青岛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，萧军工作的报社出了事，他和萧红只能选择再次流亡，乘坐日本轮船离开青岛，来到上海。刚到上海，人生地不熟，举目无亲，而鲁迅并不急于与他们相见，个性耿介的萧军发出了这样的抱怨：“我们像两只土拨鼠似的来到了上海！认识谁呢？谁是我们的朋友？连天看起来也是生疏的！”事实上，萧军的牢骚完全是由于不了解鲁迅当时的处境。几十年后，萧军对自己当年怀有的疑惑情绪忏悔道：“当我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期以后，我才知道了自己所知道的上海政治情况，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已，事实上险恶与复杂，是在想象以外的。”当时的鲁迅，已被政府当局通缉几年，自然格外小心谨慎。尽管如此，鲁迅依然及时给他们回信，只不过提出见面的事，应当“缓一缓”。与此同时，他的真诚与关怀又是不容置疑的。回信后，鲁迅第二天又给萧军、萧红写信，特别提醒他们：“上海有一批‘文学家’阴险得很，非小心不可。”并再次发出友善的讯息：“我想我们是有看戏的机会的。”

1934年11月30日下午，经过令人心焦的等待，萧军、萧红终于在内山书店见到了神交已久的鲁迅。“是刘先生和俏吟女士吗？”鲁迅直直地瞅着萧军，他一只手拿着帽子，腋下挟着一个有花纹包皮的小包袱。萧军点了点头。鲁迅和同来的人说了些什么，而后顺手戴上了帽子，说：“我们走吧！”接着，便引导二人走出书店，来到一家不远的咖啡店。萧军觉得就和做梦一样，看着鲁迅的消瘦背影，又感到十分心酸：自己一直景仰的鲁迅，竟瘦成这样了啊！为了使两位年轻人更加放松、会面更加愉快，鲁迅做了精心安排。他们三人到咖啡店不久，许广平领着儿子海婴也来了。萧红与许广平一见如故，和淘气的海婴也很快熟识了。后来，许广平曾以诗意的笔调描述过这次会

面：“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，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。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，生之执著、战斗、喜悦，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，是那么自然，随便，毫不费力，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，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。”由于萧军在之前的通信中把自己和萧红在上海的困境告诉了鲁迅，临走时，鲁迅掏出了20元钱，交给了他们，还另给了乘车的零钱。这令萧军和萧红感动不已。

大约半月后，鲁迅为庆祝胡风儿子满月，在梁园豫菜馆作东，举行宴会，特邀“二萧”参加。接到邀请后，“二萧”一夜未眠。萧红特地买了一块黑白格的丝绒布，在他们租住的阴冷的亭子间里，连夜为萧军赶制了一件新“礼服”。这是他们在上海参加的第一个宴会！在这次宴会上，鲁迅介绍他们认识了很多上海文学界的朋友：茅盾、聂绀弩、周颖夫妇、叶紫等。他还特别指定叶紫做“二萧”的“向导”，关照他们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。后来鲁迅又把“二萧”介绍给胡风，胡风专程登门看望他们，并为萧红的小说定名为《生死场》，写下了热情洋溢的“后记”。这一年，叶紫、萧军、萧红三人组成了“奴隶社”，他们的小说《丰收》《八月的乡村》《生死场》被列为“奴隶丛书”，由鲁迅分别写序，推荐出版。鲁迅告诉他：“奴隶总比奴才强。”

最让萧军难以忘怀的是，鲁迅帮助他们修改了《八月的乡村》与《生死场》。“二萧”的稿子都是用薄薄的“美浓纸”复写的，笔画很粗，字与字、行与行之间，还有墨水印，看起来很吃力。鲁迅这时经常卧病，身体很衰弱，还要忙于《死魂灵》的翻译工作，但他全然不顾这些，放下手中的工作，一字一句地仔细校阅“二萧”的小说。为了修改这些稿件，鲁迅常常忙到夜深人静，耗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精力。1935年3月28日，鲁迅在《八月的乡村》的“序言”中充满感情地写道：“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，还是时代太近，还未湮没的缘故，我却见过几种述说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。这《八月的乡村》，即是很好的一部，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，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，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《毁灭》，然而严肃、紧张，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、土地、受难的人民，以至失去的茂草、高粱、蝈蝈、蚊子

子，搅成一团，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，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，现在和未来，死路与活路。凡有心的读者，是看得完的，而且有所得的。‘要征服中国民族，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！’但这书却于‘心的征服’有碍。‘心的征服，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。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，明曾以党狱替满清治口。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，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。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证实。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，那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。”

经过艰难的努力，《八月的乡村》终于出版了。鲁迅陆续要了几批分赠给朋友们，或者托胡风拿去代卖，也托人带到了苏区抗日根据地和国外，苏联首先出版了俄译本，接着日本、印度、美国、英国、德国也出现了不同文字的版本。在鲁迅倾尽心力的扶持下，《八月的乡村》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的关注，萧军可谓一炮打响。当时，张春桥化名“狄克”写了一篇《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》，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批评，指责作品“不够真实”，鲁迅当即以《三月的租界》一文予以反击，爱护之心，溢于言表。

1936年5月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·斯诺在前往陕北红军根据地之前，在上海拜访了鲁迅，与之进行了长谈。当斯诺问到“自1917的新文学运动以来，中国涌现出的最优秀作家有哪些”，以及“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，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”时，鲁迅的回答都提到了田军即萧军，并为斯诺所选编的《活的中国》一书推荐了萧军的两篇文章，即《大连丸上》和《第三枝枪》。鲁迅还认为：“田军的妻子萧红，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。”斯诺为翻译出版《八月的乡村》，要求萧军再写点东西，于是他写了《萧军小传》，让鲁迅转给了斯诺。在这前后，鲁迅还热情地介绍“二萧”与美国著名女作家A·斯沫特莱相识。日本作家山本实彦请求鲁迅推荐几位中国进步作家的作品，在日本的《改造》杂志上刊登，鲁迅首推了萧军的短篇小说《羊》。

就这样，在鲁迅全方位的爱护和帮助下，东北流亡作家萧军，迅速在大上海的文坛站稳了脚跟。他是幸运的，因为结识了鲁迅。而对鲁迅的知遇之恩，萧军也投桃报李，还之以一颗赤子之心。几十年后，萧军在《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》一书中，回顾了与鲁迅的交往历程，他说：“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，是牢固地建立在人生四个目的的追求上的：一、求得祖国的独立；二、求得民族的解放；三、求得人民的翻身；四、求得一个没有剥削人、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。”1988年4月10日清晨，深知自己就要离开人间的萧军，最后表达了对鲁迅的赤诚之心：“鲁迅先生，是我平生惟一钟爱的人，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，我都钟爱他，希望你们也能如此，他是中国真正的人！”

## 略论萧军的旧体诗创作

□徐 刚

早期旧体诗中存在明显的“名士气”，这也是鲁迅先生在赞叹他的创作之余所竭力批评的。在后来的回忆中，萧军也毫不隐晦地指出了自己青年时代“醉酒狂歌虚度日”的名士生活。正所谓，“惟大英雄能本色；是真名士自风流！”这是青年萧军的座右铭。“那个时候，我几乎每天要喝酒，常常还要喝到烂醉如泥的地步；我做诗，和一些所谓‘名士’们断断续续，因为我比他们全年轻，还有一些所谓的‘文才’，他们就到处吹捧我的诗，称赞我的‘文才’，因此我发狂，空自一切……也在学着做‘名士’。他们甚至经常跑戏园子，也跟人到男女演员的‘下处’去串门。当时的萧军曾为京剧女艺人琴晓舫而“发狂”，年轻的诗人产生了很多“美丽的”幻想，他们因学剑术而做诗而成为朋友，《初访》《再访故居》《雪中舞剑》等诗便是为她而作。而最终，她的离去令萧军“感到惆怅”，《吊残霞》一首便记录了他当时的感情：

生成薄命踏天涯，薄命人逢薄命花！

搔首芳踪何处是？松花江首吊残霞。

这或许便是因幻想和爱情的若有所失而滋生的离愁别绪吧！在此，诗歌终究细腻委婉地敞开了他的感情世界。围绕他早期旧体诗的“名士气”，我们还可追忆萧军初到哈尔滨时的一些轶闻。那时的他自命不凡，狂傲不羁，他曾在名士们的怂恿下，给一个名叫“飞燕”的16岁“雏妓”写了一副藏头对联：“飞来峰下云千里，燕子楼头月一弯”，尽显名士风范。他还曾给自己取过一个“辽西醉侠”的诨号，因常被人叫做“醉虾”而弃之不用。这些荒唐的往事，不禁让人想起青年瞿秋白“天寒沽酒长安市，犹折梅花伴醉眠”的名士倾向。当然，诗人的使命终究是要瞩目于更为广阔深邃的生活。无论是萧军，还是瞿秋白，他们最终都告别了自己的青春岁月，迈向了更广阔的天地。在此回首他们的“名士”做派，固然可归咎于传统诗词歌赋的欣赏与把玩所必然携带的消极元素，但于萧军而言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他报国无门，苦闷异常的征兆。对于诗酒的沉湎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彷徨无助的写照呢？

### “白云原自一身轻”

其实除了早期诗歌中的名士做派，萧军诗歌更多表现的是他个人的性格与思想变化。萧军的耿直与倔强是出了名的，用“性格即命运”来概括他的一生极为准确。他粗犷直率，豪侠仗义，敢爱敢恨，有时一言不合便拳脚相向，透着一股东北的“胡子”气息。当然，他的率真和勇武，既是支撑他的光辉人格，也给他带来重重灾难。从沸沸扬扬的“王实味事件”，到纷纷扰扰的“《文化报》事件”，便可一窥端倪。他也曾说过，自己是“行武”出身，自幼爱的是“武学”，称自己是“匹夫”型的人，甚至1949年《关于肖军问题的决定》中，也说他是“才子加流氓”一型的人物。他这种不甘于向命运低头的性格，也在其旧体诗中有着鲜明的呈现。

从最初他与方未艾的“订交诗”，我们便可看出萧军对生活的严肃与执著：“男儿处世要天真，莫作登台傀儡人。疑友莫交文莫弃，相怜不过慰风尘。”此时的萧军便拒斥一切虚假的虚伪，力主个性和独立精神。而在他讲武堂的轶事则广为人知：因不满队长残酷殴打学员，萧军伸张正义，对长官朱世勤挥拳抗动，而后被关进了重禁闭室，直至最后被开除学籍。此时的他写了著名的自喻诗《开除以后》（即《言志》）：“读书击剑两无成，空把韶华误请缨。但得能为天下雨，白云原自一身轻。”这首诗沉重中带点压抑，思切却不知无潇洒，尽管全诗似乎谶语般预言了萧军一生的失落，但依然顽强地显示了诗人的坦荡和乐观。

另外，还有一首他赠别同学T君的诗，也显示了不屈的个性与不凡的心态：

欲除雄心走大荒，不堪往事误昂首。  
三年俯仰悲戎马，十载遭逢半虎狼。  
任是苍天终陨落，何问宇宙永茫茫。  
男儿自有洪崖臂，怎肯峨眉斗画长？（《柬友》）

尽管他宁折不弯、绝不低头的独立个性早已为人所知，甚至连毛泽东在给他的书信中也称他为“极坦白豪爽的人”，但他带着这样的性格走向革命队伍时，也势必与当时的形势产生矛盾。现在看来，发生在1940年代延安的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已然成为文坛公案，但通过旧体诗的方式展现的当事人的内心世界，却是萧军性格的生动写照。他的日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首写于1940年的诗歌：

相见无言一笑哀，如麻恩怨了难排。

阳春白雪音尘绝，流水高山唱者谁？

风雨孤舟归远渡，关山匹马暮临崖。

行行古道青天外，茶火丹心未忍催！

在这一天的日志中，萧军披露，“这是工作得最不愉快的一年；也是最痛苦的一年！不能前进，不能后退，不能静止，不能思想，不能不思想……忍受着，忍受着，像一头乌龟似的爬着生活啊！”积极投身他所热爱的革命事业，却依然免不了委屈和愤恨，而他又绝对不会向现实妥协的，“不能忍受这丑恶的现象，一有机会就要攻伐！容忍丑恶就是丑恶！”在此，“阳春白雪音尘绝，流水高山唱者谁”一句，颇有些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”的孤寂之感；而“风雨孤舟归远渡；关山匹马暮临崖”一联，则更是体现了他不被世人理解的怆然心态。另一首写于1942年春天的诗，也极为明显地写出了萧军凄苦的心境：

漫挥热泪写新辞，甘苦同杯只自知，

二月春寒惊客舍，卅年人海恼霜丝，

匹夫怀宝应成忤，老蚌含珠是了痴，

风雨孤舟飘欲倦，挑灯闲唱大江诗。

在20世纪的中国，对萧军乃至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，更大的委屈当然在那特殊的10年里。

《题虎月图》是萧军“文革”以后的作品，劫后余生的心灵独语却是最能表现他思想性格和人生观的力量：

漫挥热泪写新辞，甘苦同杯只自知，

二月春寒惊客舍，卅年人海恼霜丝，

匹夫怀宝应成忤，老蚌含珠是了痴，

风雨孤舟飘欲倦，挑灯闲唱大江诗。

在20世纪的中国，对萧军乃至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，更大的委屈当然